

郑子瑜自传

我原名梓榆，别号求知古斋主人，一九一六年四月出生于福建漳州市，后来跟父亲移居龙溪县石码镇。我们是清代诗人郑开禧的后裔，家境贫寒。我一生出来便在挨饿中过日子，又由挨饿中长大起来。父亲名济川，长年失业；母亲姓黄名也。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都在重病时请不起医生死去了。我不知有几个妹妹，但记得都是一生出来便送给人家去作童养媳了。

我五岁进龙溪县立第二小学，买不起笔，常去操场上检拾同学们用剩丢掉的铅笔头；买不起课本，每从同学那里借课本来抄写，养成了以后喜欢写作的习惯。小学会考得到第一名，免缴学费进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后来改名龙溪中学）。高中还没有毕业便以同等学力考入集美学校师范特别班，学、宿、膳费全免，但须兼任教学工作。不意毕业即失业，于是我报名加入教育厅委托厦门大学开办的中等学校教师进修班。我没有正式上课，更没有读至毕业，但后来却得到了一张毕业证书。毕业证书虽然得到了，可是仍然逃不出失业的厄运。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却永远找不到工作，生怕我蹈他的覆辙，所以不赞成我去读书，但我却自己钻进学校里去。不意读了许多年的书又要赋闲在家，所以父亲一看见读书写作便发火，甚至打碎了我的墨水瓶。于是我别了家，别了祖国，乘桴南渡，那时我只有二十来岁。

在北婆罗洲、汶莱、沙捞越和新加坡，我长时间从事繁重的

工作，过着非人的生活，但坚持不懈，利用一切机会读书。直到一九五八年，我终于得到一个稍稍可以喘息的机会，得以从事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先是对晚清最杰出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作研究。那时候黄遵宪的侄儿黄伯权刚自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总经理退任，我和黄氏有交情，得到黄氏的鼓励，首先对黄遵宪的思想行谊作一些研究工作；继复深入研究黄遵宪的诗篇，编写成《人境庐丛考》一册，于一九五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有人以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中有仇视太平天国起义军及义和团诸作，反对给予“爱国诗人”的称号。我以为：知人论世，须得尽读其一生之所作，庶几可免于冤抑。黄公度早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太平军的认识，容有不正确之处，他作品中难免有消极、落后的因素，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后来他的民族思想日见浓厚，对于腐儒之见也渐生厌恶。逝世之前三年（一九〇三）梁启超欲为曾国藩作传，请公度评其为人，公度致书任公云：“仆以为其学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彼视洪杨之徒，……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师。”我还指出：“批判在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学，醉心于西洋的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与夫反宗教的无神论见解，正是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年一些新派学人的思想和态度，黄公度实足以当作这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而无愧。”（《人境庐丛考》序）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四十云：“人境庐集中有一诗，题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物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物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而对于此诗的诗意，竟没有一字道及，可见梁启超并没有了解此诗。钱仲联氏笺注《人境庐诗草》，思想正确，令人钦佩，但注此诗时也没有说到此诗的寄意所在。我指出“此诗实藉莲菊桃杂供一瓶，以喻新加坡各族杂处，应该谊若一家，不应互相猜忌，而想锄去他族；黄遵宪更进而提倡异族通婚，所以有‘移枝接叶争天功，安知莲不

变桃桃不变为菊’的句子。”（《人境庐丛考·关于黄遵宪诗的笺注及其佚诗》）

我上举这些意见，很能为研究黄遵宪的学者所接受。日本的黄学者对我尤其顾爱，像铃木虎雄（同时是中国诗论史、《文心雕龙》的研究家）、实藤惠秀（同时是中国现代文学、汉语语法、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家）、铃木由次郎（同时是中国哲学、汉易的研究家）、增田涉（同时是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研究家）等日本著名学者，都曾和我通信，讨论问题。一九六一年，我为《南洋学报》主编了《黄遵宪研究专号》，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结果我于一九六二年应聘至日本，在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东洋文学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作巡回讲学，讲题为《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等等。又由于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的遗稿被发现于平林寺，我与实藤惠秀先生约定于两年后再来东京，共同编校这些笔谈遗稿，这里面有关于晚清时代（明治时代）中日两国的政治、风俗、史地、文艺、语学以及其他种种的谈论，是明治史和中日关系史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同时也是很有趣味的文艺作品，因为笔谈诸君的文才和诗才都是挺了不起的。

我来日本讲学之前，在新加坡的一个学院教授修辞学。我曾细心研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结果发现了一个奥秘：不论哪一门学科，只要能深入研究，就会透彻了解，发生浓厚的兴趣，甚至废寝忘餐，久而久之，定能有多少的成就。于是我将自己的一得之见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所敬仰的陈望道先生，和他讨论“照应”的修辞法。后来这封长信以《与陈望道先生论“照应”》为题目收入《郑子瑜选集》（一九六〇年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一书中（再后来又收入《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和《中国修辞学史稿》作为附录），香港的一份报纸和日本的一份刊物曾加以转载和译载，在海内外修辞学界曾引起了小小的涟漪。陈氏以为要使

话语文章的伦次通顺，应该顾及上下文，使之相衔接和有照应，他举“大夫不得造车马”（《礼记·玉藻》）“润之以风雨”（《易·系辞》）为例，指出：谁曾见马可造、风会润的呢？”我指出这是偏义复词，用的是复词“车马”和“风雨”但只偏取“车”和“雨”的意义，又历举古今诗文中用偏义复词的例证，并作详细的说明。

六十年代初，我还陆续写了一些修辞学的论文，在《早稻田学报》和《东洋文学研究》发表。在《东洋文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发表的一篇，题为《汉文的特殊修辞技巧》，东洋文学研究会会长大矢根文次郎教授利用《编后话》全文加以评介，赞誉有加。这件事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更加苦心钻研修辞学，清晨、夜晚、假日都利用起来。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应聘任东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员，每周给该校文学院和教育学院的教授们讲授两个小时的《中国修辞学》。就这样，我竟一跃而成为国际著名大学的教授之教授。我在讲学期间，得到了启示，适逢由全日本中国语学科教授组成的中国语语研究会请我讲演，我便讲了《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我说：“谈到中国文学的变迁，有中国文学史；谈到中国哲学的变迁，有中国哲学史；谈到中国史学的变迁，有中国史学史；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变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只有中国修辞学却还不曾有史，所以我要作大胆的尝试，来和诸位日本汉学家谈谈中国修辞学的变迁。”这篇讲辞于一九六五年由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列为研究所丛书第一种。我同时得到语学教育研究所的证书（此后我继续搜集中国修辞学史的资料，历十余年之久而不辍）。我也实践前约，与实藤惠秀教授共同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于一九六八年由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这书出版后，日本、中国大陆（《光明日报》等）、台湾、香港、欧、美等地报刊都为文评介。

《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出版后，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也都起了

广泛的影响。据孙传钊《台湾修辞学研究概述》一文所说：

一九六五年郑子瑜先生写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在台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台湾学者在撰写修辞学专著时也都在书中用专门章节来回顾和描述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史，让读者对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和概貌有一个鸟瞰式的了解（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修辞学习》）。

至于中国大陆对此书的反响，是一九七九年以后才见到的，留待以后再说。

一九七三年，我应邀发表论文于英国牛津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家会议。一九七八年，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为了创办外语学研究院，聘请我为《中国修辞学研究》教授，我乘此机会整理前此搜集的资料，并日以继夜，动笔著述《中国修辞学史稿》。我身居海外，要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确困难重重，正在心灰意懒之际（一九七九年间），忽然接到德国学者Dr. Harald Richter的来信，告诉我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复旦学报》有一篇论文题为《陈望道同志的治学特点》，引用了我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对《修辞学发凡》的评语。我之所以能在治学条件远不如人的情况下，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完成我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实在得力于这篇文章的及时鼓励。《中国修辞学史稿》约四十余万字，于一九八四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郭绍虞先生生前为此书撰写序文，誉我是第一个研究中国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此书是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他所写的《语法修辞之学与语义之关系》（载一九八一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更指出“在修辞学一类的著作中，我见到引文（天祥）氏之说（指文辞与言辞之分）者只有海外学者郑子瑜氏的著作。（指《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后来复旦大学出版《〈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一书（一九八三年）所收吴文祺、胡裕树、宗廷虎……等名

家的论文，也相继引述《中国修辞学变迁》一书对《修辞学发凡》的评语。

《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后，香港各报刊及上海《修辞学习》、杭州《语文导报》……等都著文评介，毛海波更写了两篇专访稿，分别在青海《人才天地》和《福建青年》刊登。复旦大学的李金苓和易蒲，合著《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的《复旦学报》发表，指出“经过二十年的不懈的努力而写成的《史稿》，远非《变迁》所能望其项背，业已达到了汉语修辞学史研究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一九八四年，我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直到现在。一九八六年，我被聘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到校参加应聘仪式并讲学，讲题是：《我从甲骨金文中发现了谈修辞的记载——中国修辞思想已不能再说是萌芽于先秦诸子，而应该追溯到商周的甲骨金文了》如果我的说法能够成立，也可以说是另一次创始性的演讲。我希望前辈和比我年轻的学者，能继续发掘，使甲骨金文中的修辞思想，显得更加丰富！

我最近撰写《语法修辞结合论行得通吗——给汉语语法修辞学者的公开信》，得到吕叔湘、张志公、胡裕树、林文金、陈亚川、宗廷虎、范开泰等十余位著名学者回信表示意见，陆续在《修辞学习》发表。我的小传被编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大学名人录》（日本教育通讯社编）、香港出版的《中外文学家辞典》（黄锦池编）、《星马人物志》（宋哲美主编）、《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李立明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阎纯德主编，秦川、龚明德为执行编辑）以及《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五分册（陈亚川编辑并执笔）等。

我从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逸经》文史半月刊发表文章直到现在已超过半个世纪了，只有对黄遵宪的研究和对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比较稍有心得。我以为治学成败的关键在“决心”的有无，

治学的方法只有“有恒”二字，有恒的研究才会深入了解，深入了解自会发生兴趣（所以说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常听一些青年朋友说：“我对某门学科没有兴趣”，这是对某门学科还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兴趣既发生，欲罢不能，日子久了，自然会有多少的心得。这是我小小的经验，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们能和我共同奋斗！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写于香港

